

社會實踐報告

玫瑰色的你—

〈社會運動參與的反思〉

有一天醒來突然問自己
這就是未來嗎
這就是從前
所耿耿於懷的未來嗎

—夏宇，〈同日而語〉

最後一次社會實踐—反思與紀錄之必要

你感覺自己將參與這歷史的一刻；

在一區域中，整體生活模式裡很深刻的某項東西即將轉變…你正在…創造…歷史。從某方面看來是全然無私無我，但你也同時發現了自我。

—道格·麥亞當〈自由之夏〉

談到社會運動，往往可以想像到的是各種悲訴的記者會、警察阻擋與學生暴力、舉牌抗議、街頭宣講，軟性的也有舉辦講座、訪調活動、發放傳單、舉辦連署。各式各樣的活動展現不同的生命力，我們也常聽見不同的社運歌曲被傳唱，因為反媒體壟斷而被聽見的〈晚安台灣〉也是一例。運動有許多可以討論與分享的面向，也有需多歡樂的場面與嘉年華式的遊行，可愛的標語、廣大的人潮。

但這次遺憾地，並不討論參與社運那些快樂歡騰的面向，不會提到音樂、繪畫與藝術在社會運動中的各種創意，不會提到在參與議題的場合我們與工人們如何打鬧嬉笑，擁抱在一起哭。

這是最後一次的社會實踐報告了，這次，我決定以個人參與社會運動為主題，將參與中的所見所聞，個人的反思與疑惑提出，作為社會實踐報告，也是一份簡略的田野筆記。這是一個有點沉悶的報告，不是用來吸引更多的親朋好友投入社運，而是我自己對於參與的反思。

所以，想要完成這樣一份報告，並不是因為認為社會運動是如何神聖，或是如何悲壯如何特殊。事實上，我並不是特別聰明的人，也不認為自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操。在自身參與的過程中，情緒是紛雜的，思緒難以釐清。經常在各種選擇與判斷中猶疑，深怕分析與決策錯誤導致運動的失敗，壓力之龐大，甚至面對不同團體更是需靜觀其變，冷靜面對；在個人層次上，擔憂自己的發言是否政治不正確，又或著自己應該「犧牲奉獻」到什麼程度？自己所處的位置是什麼？為了什麼而戰？

除了疑惑，猜忌、懷疑、憤怒也經常發生。對我而言，參與運動並非他人所想像的義無反顧，捨己為人，也並不那麼具有神聖性，並不總是充滿光環，反而是在運動的參與更發現自己卑劣醜陋的一面，發現自己所處的是什麼樣的位置。就是由於感受到自己並非能才亦非聖賢，作為一個平庸的參與者，厚顏地想將參與過程中遭遇種種疑惑與困難寫下。

言歸正傳，事件的發生、組織的運作、情緒的發酵、資訊的收集，到搏得版面，被眾人所關注，有其機制，但人的注意力與媒體所播報之有限，努力經常被濃縮與簡化，參與的喜怒哀樂卻仍存在每個運動者、異議者身上。運動成為生命，

不應是理盲、濫情，或是進步、激進可簡單概括的。雖然上述提到將以自身參與的疑惑與困境為主，但也絕對樂意在其中加入值得分享的經驗，美好的、快樂的、啟發的等等，試圖在回憶與反芻的過程中，找到更多可以思考，也能做為未來學弟妹參與活動之借鏡的提問與反思，或著層次再低一些，整理出周遭朋友們討論不同問題的方式，也是野心之一。

多元的運動可能有相似的疑惑，相似的運動可能有著多元層次的討論，一直都很想針對自己的參與經驗有個回顧與紀錄，但連續兩次因為時間趕不及而未能做好報告，實在非常遺憾。真的很高興有系上能有這樣的活動，對於我這樣的懶人，特別是將要畢業的自己，可以透過社會實踐的書寫，去回顧這幾年的參與和觀察，並對於其中的破滅與成長進行簡單的反思。

最近幾次更是抗議事件頻傳，說要針對單一事件又覺得有些可惜，畢竟是最後一次的實踐計畫，故決定將有限的個人經驗與自身單薄的參與觀察，進行一系統性的整理，盡管所能討論面向有限，但不僅是自身思緒的整理，也希冀未來若有學弟妹對社會運動感到興趣，這份筆記能有所助益。

社運需要英雄嗎？—自身性別的困境

If you waste women,
you will waste everybody.

—第四屆世界鄉村女性大會，南非德本

回想過去，在我的成長背景中，由於學習環境以女性居多，家中亦未對自身有太多的性別規範，因此在個人性別的認同與探索上沒有太多想像。一方面並未特別感到自身是女性，也不特別去認同或感受身為女性與社會的關係。

真要討論，是從華隆罷工開始，在一個追求陽剛氣質的場域，才發現原來性別竟是如此幽微的在影響不同的參與形式，也感受到自己身為生理女性是如何被對待。以下大致簡述幾點在運動現場遇到幾項具有性別意涵的問題。

(一) 工運現場的小故事

之一：

在罷工現場，男性工人經常在辦公室前聚會，喝酒、抽菸、吃宵夜。某天晚上與大哥一同吃宵夜的燒酒雞，酒酣耳熱之際大哥們又開始抽菸。大哥們拿出菸來給參與罷工的男性同學，遇到女性學生則跳過，「女生不要抽菸啦！」，取而代之的是水果。

之二：

同樣的場景，某日宵夜時間，有位大哥一反常態，遞了一支菸給我。其實完全不會抽菸，不過一方面是常常看到系上老師在陽台抽菸的樣子，罷工現場又屢見工人一支接著一支，抱持著未來在田野研究上也可能會以此做為與訪談者接觸的想像與好奇，拜託大哥教我抽菸。點燃了人生的第一支菸，意外的並沒有特別不習慣之處，還覺得很有趣，開心的跟著大哥抽了兩三支。

隔天早上，一位沒有抽菸習慣的男同學走過來說：「不用因為想要跟工人接觸就勉強自己抽菸，可能因為是女生，但也不用為此刻意表現得比較陽剛。」勉強？抽菸是男性特權？

之三：

某次討論中，因為之前講座負責人入選已經確立，但部分同學仍認為應由我負責。由於我已屢次提及無法擔任負責人，於是在討論中我便以比較大聲的口氣，

不太高興的說我真的沒有辦法擔任負責人。突然現場一片寂靜，幾位同學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表示我不需要這麼情緒化，應該更理性一點，「冷靜一下，讓情緒平復」。當下直截的聯想是，為何過去幾位男負責同學生氣時得到的是「好那我們來談談」，而我的抗議(明明是有理據的)卻被當作情緒化呢？

之四：

「欸你好，我是B(男性)，你可以幫我跟C(男性)說一下我等一下會過去嗎？」一位男性打來。「噢，你可以直接跟他說阿？」我回答。「你不是他的小秘書嗎？」B說道。

之五：

「今天的推擠會失敗，是因為前面一排都站女生吧！」「女生也是很會推擠的好嗎？」「喔抱歉，前面一排的女生都太有氣質了」「你真的很沒有性別意識」「現在都是危急存亡之秋了，討論性別格局也太小了吧」檢討會上與一位非常討罵生理男性的對話。

上述的筆記是在華隆罷工時寫下的，事實上還有其他許多例子不及備載。當然，這些問題並不僅只發生在工運現場，在我與其他女性的參與者聊天時，也常討論到生理女性在運動中如何被看待，以及一些極盡誇張的例子(甚至牽扯到性騷擾)。又或著，女性在參與過程中，往往被認為扮演小秘書、花瓶、某人的女朋友、宣傳圖的模特兒等。甚至於在某次討論中，比較積極的女性參與者，被認為是「權力慾很強」等，相較於男性參與，女性在政治領域的投入往往遭到污名。

從細微之處可以看出大家對女性角色的期待與偏見。女性總被視為純潔的、乾淨的、處理瑣碎事務的、細心的，但找出如上的反例實在輕而易舉。一個粗略的觀察是，在工運場合中要求陽剛氣質，因此陰柔氣質相當容易被邊緣。作為生理女性，要不跟著一起變得非常陽剛(但如上述所見，可能還是會因為生理女性被拒絕在外)，要不是被邊緣化，放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上。

(二) 女性參與討論的結構限制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外在對女性的眼光無關痛癢，自身地位利基於能力，種種困境可以隨時間被打破，然而真是如此容易嗎？(其這樣的論述本身便非常奇怪，已經承認了女性參與的起始條件並不相同)即便無視外在對自身投注的眼光，在參與過程中也不必然是完全平等的。從台大學生會選舉女研社所頒布的聲明¹中，我們看到許多值得討論的部分：

¹ [政見]學生會長選舉 台大女性研究社聲明 <http://www.ptt.cc/bbs/NTU/M.1337864307.A.A5F.html>

為什麼我必須這麼詳細地點出在參與學代會上的時間呢？因為身為家居台北的女性學代，這些夜晚的討論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我個人認為，學生自治最精彩的地方，不只在於對公共事務的提案上，也在彼此尋求奧援的過程中。一般人對學生自治的想像，僅是開會、表決，卻往往忽略了建立人際網絡的重要性。學生自治也是政治，而政治的精髓，乃即在尋找可信賴的盟友。女性學代所會面臨的困境，除了必須在很可能是獨立參選的基礎上，打破彼此從前並不熟識的僵局，主動在（以男性為多數的）環境中尋覓合作伙伴，同時在討論過程中，也往往因為場地限制，而配合男性同事們的習慣，如於男宿開會等。

在過往委員會的討論中，往往只有我一位女性在場。同時我也發現自身因為立法知能的缺乏，在面對強大的男性前輩時，會使我無法有效地反映出我自身的意見。加上整個學代生涯中，幾乎接下一整年的祕書處業務，這些行政經驗固然寶貴，但在我心力交瘁的情況下，也十分不利於我累積一名學代應有的經驗與能力，如同時兼任委員會主席（以參與校務會議）等等。

上述的討論點出討論時間不友善、意見表達不友善造成的困境，這樣的困擾與女性被賦予的想像有關。學校可以提供之夜間討論空間不多，在男性居多的討論下，必須到沒有限制異性進入的男生宿舍進行討論，對部分女性來說是個壓力；又，家庭因素使得女性無法全程參與開會，即便提早結束，後續一些建立情誼的活動，如：吃消夜，也經常無法參與。更細緻的討論是，在這樣政治化的組織中，不少交際的場合需喝酒、抽菸，這些男性情誼建立的方式常成為女性參與的門檻。結盟的容易與否也成了長期下來形成的差異。又如上述，經驗來自於瑣碎事務的處理，即便是重要事務，但在作為一個政治活動的參與者來說，並不真的能累積到什麼。在缺少誘因的情況下，女性的參與意願也漸漸下降。

(三) 「女神粉絲頁」：女性參與

除了上述對於女性參與形象以及實際結構限制外，最近一項耐人尋味的現象是網路粉絲頁的興起。Fb 上有設置個人粉絲頁的功能，由於設置門檻低，故大家經常開設朋友的粉絲頁作為一種娛樂。前一陣子關於英雄與英雄主義的討論在社運團體也颳起了一陣旋風，許多朋友開始互相設置粉絲頁，作為一種對英雄主義的嘲弄。

然而本次想聚焦在粉絲頁命名的性別意涵。以個人的所收集到的粉絲頁命名如下：

女性：「人權美人謝小咪」「反對舒晴女神壟斷_要女神公共化」「老王 TM_以聖潔的身軀擁抱骯髒的社會」「那許恩恩怎麼辦？」「叫廖金鳳閉嘴」「北大社運女神佳玉」

男性：「反朱家安粉絲頁」「讓我們進入下一個易澄」「社會所寶寶大主廚」「董公的左派奇幻之旅」「玖哲，這樣對嗎」「C君」「幹陳為廷你在發爛梗試試看」「緬辦」「社會小猥褻_呂眼皮」「李展松」「傅偉哲的魔爪」「[\[台大學代會高級資深學代\] 洪崇晏](#)」「陳亮甫，MD」「北大傲嬌少年年佑大大」「Yif」

暫且不管粉絲頁數量差異可以看出女性在參與中市占如何少數，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命名上，女性往往被強調出「女」的一面，或稱美人，要不是女神，「那許恩恩怎麼辦」則是因為其男友的關係設置此粉絲頁，也就是說在極少數的狀況下不會以外表與女性身分作為凸顯。男性參與者則多半基於自身特質，鮮見強調性別者。除了「北大傲嬌少年年佑大大」有點出男性身分，但那是我創的。

事實上，除了網路，在實際生活上，較為核心的幾位女性參與者也常常被開玩笑為「女神」。這種對女性參與的強調，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涵呢？

以我個人相當困擾的是，我也被朋友創了粉絲頁，由於以女神為名，許多朋友也樂於以此調侃。粉絲頁莫名其妙有著人氣，這非常有助於在社運場合建立人脈；但就個人來說，不太喜愛被強調自身是女性這件事，個人認為在性別光譜上，自己並不是非常具有女性特質的人，卻因為粉絲頁一再被強調。對此內心十分掙扎，到底要不要和管理粉絲頁的朋友提到這件事呢？

必須承認，就這麼符合主流對我的想像，有個所謂「女神」的粉絲頁，有幾張漂漂亮亮的照片確實可以得到回響，但自己卻因為性別認同被忽視，或著說有所衝擊，而感到不習慣。

對這種玩笑地強調至今仍不確定要以什麼樣的方式面對。在與男性朋友討論時，朋友認為這樣的稱呼對於男性夥伴來說是一種安全的包裝。其中確實有其性別意涵，但由於這樣的稱謂可說是稱讚，卻又可當作調侃的方式，保持在玩笑與尊重的邊界。因此，是基於男性對於參與其中的女性不知如何互動嗎？為什麼女性身分就如同其他參與男性的特質一般，是值得被強調出來呢？這樣的現象很細微，但也頗為有趣。

(四) 然而，重新反省

儘管上述的討論仍存在於社運組織(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領域)，但面對此一現象，值得進行一些反思。近日以來，由於部分參與的生理女性性別意識的抬頭，對於異議性社團/學運社團而言，陽剛氣概的展現往往是一件令人恐慌的事情。更精確的說，我們對組織「陽剛氣概」與「父權」的想像已經泛道德化了：我們總是可以輕易的在開會中或議題討論時，指出許多人身為男性對組織裡的女性、弱者展現的壓迫。

可是這樣的指認並不能夠解決任何問題，往往流於某種指責：一種政治正確的指責；換句話說，道德化的指責。我們已經不是在解決組織的父權問題，光憑個人的努力似乎不可能將問題根除——不是社長在開會時強力要求所有與會者都要平心靜氣的講話，或者設立一條規範讓那些大聲講話、搶人講話的人不能多言…等等，能夠解決。

父權的樣貌是制度的，更是文化的。異議性社團是一個高度政治的組織，我們總是企圖改變校園、改造社會，如何行動總是牽涉到路線的爭辯。如是，路線與論述的生產必須倚賴組織行動者的討論，如何父權、如何陽剛便是組織的文化。並且不可避免的，當主流社會習慣於使用這樣的模式進行所謂有效率的討論，我們亦很難跳脫出這個模式，否則我們很難想像出另一套討論的方式。我的意思是，當我們指責我們的幹部講話太大聲以致組織裡的男性無法發言時，我們不應當將責任歸咎這些講話大聲的男性。更幽微的真相是：在組織會議這個需要演辯能力的場合裡，只有「那些男性」，才有能力在開會場合流利發表見解。

那樣引發討論、反駁對方論點的能力，是需要長時間培養的，需要透過人與人緊密的互動與演練，才有成熟的可能。被社會建構的男性，是被鼓勵在生活中進行政治討論的；基於男性情誼組成的小團體，則是這種「演練政治於日常生活中」的場域。男人是政治的這件事並非純出天生，它被期待擔任國家的重任、負擔經濟任務、被指派重要政治位職。所以，在男人的小圈圈裡，那些討論都是練習政治的一環，而垃圾話、抽菸、喝酒則是這種小圈圈裡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排他性成為女性參與小圈圈演練政治技巧的可能性。

這讓少數亟欲參與政治的女性，不是變得更像「那種」男人，不然就是邊緣化。

自從認知到「性別」之於組織而言的重要，對陽剛氣概與父權的指控往往是組織內部一件政治正確的事情，然而政治正確的指責即是道德化的指責，我們在這種指責之下窮盡心思卻苦無對策。

某位參與夥伴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男人終究是男人。男人與女人被社會所期待的終究太不同，男人們打從一開始就是政治的動物，我們很難窺知女人艱困的處境。女人的艱困是男人生命中從未有過的；而這意味著兩件事，一是男性難以窺見自身所處的優勢（被社會期待的「政治性」和小圈圈對於政治能力的反覆演練），二是男性將對解決女人參與政治的辦法難以發想。而女人就在這樣的過程中被孤立、被男性化、與男人同質化。

這不是在說個別男性的努力將無法改變組織裡的父權與陽剛氣質。我想說的是，我們該進行何種制度設想，來翻轉整個組織裡的性別角色關係？或者我們該

建立何種文化，讓每一個在組織裡參與弱勢的人，其聲音得以被聽見？這是非常困難的，看不清楚敵人的仗，但仍然有持續改變的價值。

對於女性參與，上述的觀察多來自於工運現場、迫遷案件以及幾位參與校園自治的夥伴。一位夥伴曾提出樂生青年聯盟與農村青年陣線的女性則占大多數，並非男性主導。遺憾的是這兩項議題並非筆者所熟悉，女性在這幾個議題的參與呈現什麼樣的狀態，可作為未來的田野目標。

學生和各位站在一起！—自身與群眾關係的檢視

跟我們一樣的開發中國家
不滿時政的知識份子
他們生活於貧民窟
引導自己的同胞

同樣的知識份子在我們國家
他們坐在咖啡屋裏
以激烈的學術爭辯
關心低階層人口
—劉克襄，〈知識分子〉

在社會運動參與中，學生似乎總扮演著相當特殊的角色。

在各種場合，全國性如反核(但現在趨勢更接近全民運動)、關廠工人，地方則如反苑里風車、台大紹興社區、華光社區、樂生療養院，都可以見到學生運動者的身影。華隆罷工最為激烈的幾天報上寫著「華隆工會、學生肉身擋車護機具²」、反媒體壟斷如此全國性的議題說：「學生青年站出來」。

現下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似乎已有一股趨勢，對於學生角色在運動的位置也開啟了不少討論。在此想要細緻的定義，筆者認為學生運動仍可簡單區分校園內運動與校園外運動。校園內的學運可聚焦在直接與學生相關的議題，如：宿舍門禁廢除；校園外的學運則是學生參與其他公共議題，使用學生的身分與立場以彰顯「我們不要這樣的未來」。

日前何明修於蘋果日報刊登〈學生權力的誕生〉³一文，提及士林王家、華隆罷工、紹興社區與反媒體壟斷之參與學生，描述近幾月以來學生參與不同社會抗爭，並跳脫既有框架成為新興力量。對此，趙剛於〈學生權力？〉⁴回應則認為學生主體與力量不應由教授登高一呼，替學生拉高層次決定其參與樣態與訴求。畢竟，界定學生力量走向為何，也是作為教授的一種權力展現。

從兩種論述中，可看出學生參與校園外公共議題的特殊性。何明修老師對於學生參與提出兩種層次討論：在技術層次上，學生或許可扮演網路使用與消息散

² 2012/08/28 自由電子報〈華隆工會、學生肉身擋車護機具〉

³ 何明修，2012，〈學生權力的誕生〉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207/34690294/>

⁴ 趙剛，2012，〈學生權力？〉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fromgroups#!topic/yotu/TPXDPv-MMVE>

播的角色，不依賴主流媒體而藉由臉書粉絲頁進行資訊傳遞。當然，臉書所吸引與對話的族群，以及其影響可待討論。另一方面，也是趙剛的回應中所想談論的，在參與運動中，學生的非社會性格以及某程度上與社會的距離，使得學生此一符號往往在運動中具有特別的意義。學生的純潔性與理想性被賦予許多期待，在主流媒體播報方式中可見一斑。

然而去觀察大學生為何在媒體中如此受寵，可以發現的是大學生於社會中仍有階級上的意義。在知識上的優勢與不和利益掛鉤的想像，加深了大學生參與運動的正當性。在此方面，個人的觀察是，並非所有大學生的參與都是媒體/社會認為具有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們不會看見元智大學強力聲援某某社區，但台大學生參與紹興與華光社區則是值得報導的；在立報「學運青年的學思之旅」系列專欄中，亦發現受訪五位學生皆為台大生。不論是從參與條件或是台大所彰顯的意義，或許都具有階級的意涵。

關於學生的主體性，先前也在學生族群內引發不少討論。有些人認為學生應掌握自己的主體，而非如同救火隊，東奔西跑，但無法聚焦於真正應被改革的問題上，提出自己的創見；有些人認為學生族群是流動的，參與僅為輔助角色，提供資訊與技術的協助，又或著當警方開始推擠拉扯時，學生身分可作為一種保護盾，因不敢大力拉扯而延長衝突時間。簡言之，學生應在不同情境下作為符碼與工具使用。

這樣的爭辯似乎在野百合時代便是難分難解的議題。以台大「自由之愛」學生會系統與其他學校「民學聯」兩大派別便有著不同的看法。前者是較為菁英主導，認為青年積極參與社會上的問題，是為了回到校園，或著說回到某種體系(學術，或著政治)尋找解決的方式，以改變社會；後者則認為，青年作為社會的一份子，與群眾站在一起的方式即是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因此青年應作為協助者角色，提供智識與策略建議，批判社會也不忘自我批判。

陳信行的〈我的野百合〉則對於兩者有所討論。在其文章中，於前者的批評，認為理解不僅是看見，若無法真正體驗到群眾的生活處境，亦會被經驗所限制，何況學術的爭辯往往過於抽象艱澀，離群眾過於遙遠，許多社運參與者往往認為研究者不可能與群眾站在一起；後者批評則在於實踐上的困境：即便強調共同生活與自我批判，但在社運場合中政治機會的流轉更強調智識的需求與策略擬定，因此所謂的站在一起，到頭來實則成為軍師，是否真正「站在一起」，則是值得商榷的。

對於這種討論我目前仍無法完整提出我自身的判斷。在參與過程中，去體認到群眾的能動與生命的勃發，我當然不認為需要所謂的菁英主導，但在實踐上卻又不得不承認確有困難。就連聽來最尊重眾人決定的審議民主，實際上常面臨

幽微的不平等，又或著所謂理性討論本身隱含著階級想像，「眾人的決定」一事如何可能？另一個問題是，即便去反對菁英，反對強勢者的主導，當我自身沒有具備足夠的能力去應對各種問題與困境時，我又如何能協助議題的產生？

回過頭來我想反省的是，參與者的意象是如此二分嗎？我們應該站在何種戰鬥位置上？在未來的參與上，面對人生職涯的選擇，想必這樣的疑問更會被凸顯。如何繼續思辨在不同位置上的戰鬥方式，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一定要去現場——知識圖像的拓展與人的想像

我不和你談論詩藝
不和你談論那些糾纏不清的隱喻

我不和你談論人生
不和你談論那些深奧玄妙的思潮

我不和你談論社會
不和你談論那些痛徹心肺的爭奪

請離開書房
我帶你去廣袤的田野走走
去探望一群一群的農人
如何沉默地揮汗耕作

—吳晟，〈我不和你談論〉

參與的過程中，雖有上述問題，但每次運動絕非毫無收穫。至少，每次參與都是一次知識圖像的拓展。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一個議題，或著學生參與者為了能更明確地擬定訴求與策略，我們往往必須與所謂的弱勢族群共處生活，去聆聽他們的過去與未來，面對他人的生命赤裸展現眼前。而當參與回應到了自身生命的經驗，亦有不少衝突與激盪，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去認識自己是什麼樣的人，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

好比在華隆時，訪調的過程總是令人驚訝。在尚未接觸前華隆工人，對工人的認識僅是報章雜誌與故事，或著再好一些是馬克思理論，他們如何辛苦、如何慘烈，而作為學生我們應當如何如何幫助他們，如何如何建立所謂階級意識。但走入田野後，工人一詞已不僅是過去單薄傲慢的想像。華隆的阿姨們是如此願意分享他們如何看待自身的勞動，如何引以為傲，甚至有些阿姨們會幫機器取名字。又好比我的其中一項田野筆記：

在大潤發附近發放傳單。遇到認為罷工有商討空間的路人與發傳單的學生們爭論。該位女士認為就是因為工人們不努力，才會落到不良的勞動位置上。由於大潤發是該處人潮聚集處，許多早班工人正好下班前往購物，也在一旁聽到了這段對話。其中一位阿姨生氣的說：「我們怎麼會不努力呢？從以前一天包裝 70、80 箱，到現在可以一天就包好 100 箱，怎麼會是不努力呢？念書升官才叫做努力嗎？你知不知道你們穿的那個 XXX 是我們做的？台灣有多少人在穿那個阿！」

或許可以說這就是「虛假意識」，被資本家操控不自知還沾沾自喜自己的生

產力，但也令我好奇，從阿姨口中的勞動，是高度專業的(需要警覺每個機台的運作，分辨每條絲線的狀態，快速抽絲引線)這挑戰主流想像「所謂工人不夠聰明才會從事可被替代的工作」，又，對過去所讀理論的淺薄認識，使我對「異化勞動」的概念更為好奇。如果所謂勞動是機械性、與自身抽離的，為什麼在這群工人，會替自己的機台取名字的工人身上，好像看到一種自豪，對自己的勞動與產品有認同的人呢？華隆的勞工有什麼樣的特性呢？還是罷工過程中反覆重述自己的勞動經驗與工人口號，致使他們開始認同自己作為工人這件事呢？

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假的議題，但至少在訪調過程中，我的「工人」想像從平面的、淺薄的，成為立體的、多元的一種。更延伸而言，這次的活動，使華隆、苗栗、工廠、勞動，於我而言有更多的情感與想像，也讓我認知到，尚未真正有著經濟壓力的自己，過去的認知是多麼的貧乏。

在參與非主流議題的過程中，我得以看見新的價值與新的生活方式。有時難過，有時深受感動。當我去傾聽到同志出櫃的難處，跨性別者在面對自身情慾的複雜與難解，我看見愛情的艱難；當聽見女性的參與者吐露他們對性別的想法，我看見女性在平等的包裝下其實如此不平等；當都市更新與歷史錯誤底下的迫遷戶談論他們的過去，我省思對發展與現代感的想像；當樂生療養院的院民們告訴我們他們的過去，我看見一種老去的方式。我的生命經驗不斷被修正，被衝擊，被提醒這世界是多麼與眾不同。

這個世界實在太精采了。有時我甚至疑惑，會什麼有人會說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的話。這個世界實在豐富得無法言喻，各種生命的樣態，被看見、看得見、看不見的，如此多元。有時會看見人們因為自身的身分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而感到悲憤莫名。同樣生存於世，卻因為無法被社會認同，或著無法認同自己，必須否定自己，或是痛苦地活著。希望每個人，不會因為自己屬於某個身分、階級，或是擁有某些異於他人的特質，而感到活著是悲哀的事。若能有一個社會，大家都泰然接受自己的狀態，不必否定自己而感到痛苦就好了。

回過頭來思考，如果要說什麼樣的原因挺身而出，其實好像很難說出個所以然。可以肯定的是，在參與的過程中，因為那些玫瑰色的人們、因為土地的濕度與溫度、因為過程中體驗到各種悲傷沉重與喜悅感動，讓自己去思考作為一個人的樣貌，思考自己和社會的關係。因為看見了各種生命的面容，選擇去愛，希望世界可以變得更好。或許一直是一種過於樂觀的心態，可是，比起來說這個世界就是如何如何，更想與之對話，探索更多可能。

改變世界的資格？—對於社會運動參與的反思

振作點好不好？
牆在那裏，不塗鴉行嘛！
街頭就在那裡，不上行嗎！
—松本哉，〈素人之亂〉

曾經有位社運夥伴開玩笑地列出「你的激進指數？」指標，上面不外乎是「你是否有過被警察推擠/街頭宣講/被告/參與遊行/舉牌/唱戰歌/網路筆戰的經驗？」社會運動的參與經驗無疑是特殊且無可取代的，特別是在赤裸地面對國家暴力時的那種無助感，往往造成更多的「憤青」。社會上有人願意為了那些難以發聲的弱勢者、為了理想犧牲奉獻是件美好的事，只是對於參與的姿態在社會運動中的意義有時也感到疑惑。

在這個篇章，我想討論的是參與運動本身的某些思維帶給我的一些矛盾與困擾。許多參與社運的學生被塑造成犧牲奉獻，然而進一步去觀察，別說在媒體曝光，光是能夠持續投入運動是需要許多條件支撐的。又甚至，在參與過程中的各種經驗，使許多工作者將自己與所謂的「沉默大眾」劃分開來，我總認為這種對立值得挑戰。遺憾分析相當困難，自己尚未有時間好好釐清當中的思緒，僅能就所體驗的部分暫且紀錄，拋出自身的疑惑而已。

之一：「要認識一個議題，一定要去現場」

某個場合裏面，講師鼓舞人心地談到他的工運參與經驗，結尾提到：「要認識一個議題，一定，一定要去現場。」這句話非常勵志，對於許多「去過現場」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如果不是親眼看見體會他人的痛苦與壓迫，很多鍵盤參與也經常令人感到缺乏生命。事實上，在本次報告的其他篇章中，我也分享許多自己參與到「現場」的收穫。不過，之前與某位學姊分享這句話時，她說：「只有沒有在『現場』的人，才需要去『現場』吧。」這句話相當耐人尋味。

參與議題，真的一定要去現場嗎？又或著說，這句話背後似乎有某種想像：「參與者本身不會在現場，因此我們才要去」。這句話似乎能巧妙地呼應前面對於學生參與運動的討論，因為學生所處的社會位置有其優越性，又或著說能當到大學生的其實具有某種階級的同質，因此當我們是個關懷社會的人的時候，意指我們須到真正受苦的人面前與之接觸。

不過，首先，仔細去拆解這句話的涵義，是認為我們要感受到人的苦痛，看見人的樣子，去同情理解才能夠認識。到了現場就能認識議題嗎？看到叔叔阿姨阿公阿嬤哭泣，就是認識議題了嗎？如果看了仍不為所動呢？(我想，不少行政官員都看見過了)又，什麼才是認識呢？其次，大家真的都有條件到現場嗎？

比方說，以我個人很難到台南反鐵路東移的現場，與居民訪調，也不可能每個周末就到一個現場去。極端一點，倘若今天全台兩千三百萬人都到了某個議題的現場去認識議題，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事實上，在每個公共議題所描述的結構下，我們都在所謂的「現場」。我並不是要批判去現場如何，也不是認為社運工作者不辛苦，但我總認為這不應做為一個劃界的門檻。所謂的現場，即結構暴力的體現，我們透過他人的苦痛去察覺這種結構暴力，進而提出我們想改變的方式。在不在現場真的那麼重要嗎？我想講師的原意或許也沒有這麼複雜，然而對我來說，要認識一個議題，有沒有達到共鳴是很重要的。

要談社會運動，不到現場的運動當然有疑義；但以公民參與與關懷的角度視之，在建立參與動機方面，到現場是一種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我認為不是絕對的。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在現場耕耘，因此以之作為參與限制是相當高的門檻。我總認為，社運工作者應當要做的是看見群眾與議題的共鳴，而是如何讓有興趣的人們以自己的方式認識議題。跟議題有了共鳴，或著像部分社運工作者喜於使用的詞彙：「感到被召喚」，是一種基礎。在此，我想分享一篇社論⁵的結尾：

庸俗嗎？或許。矯情？可能也有一點，畢竟這人看到路邊的流浪狗在受苦，多半也是無感而過。但就是這些那些平凡的憂慮，淺薄的愛，瑣碎的牽掛與計較，繫我們於現世、於土地。一個老百姓怕死沒有什麼不對，一個平凡人眷戀他的小日子也沒有什麼不對，即使這其中藏著壓迫的結構，這些人的恐懼和眷戀都不是錯的，否則所謂左派的關懷，還能關懷到什麼樣冰冷的處境？我們當然希望最終不再有壓迫的本源隱藏於庸俗日常之中，當然希望人人關心自身處境的同時，也有能力看見更弱者的處境，但是真正需要拔除、批判的，並不是人對自己淺薄的愛，而是不願去關切他人的麻木與「不動」。

說到底，要怎樣的深思，才算深思？要深思到什麼程度，才不叫盲從？

要具有怎樣的資格，反省到多麼透徹，我才能說，我反核，是想清楚了，不是跟隨流行？反思與行動是兩個不同的層次，且可同行而不悖。在思想上我們應追求深化再深化，並給予群眾大量、不間斷的刺激，但在行動門檻上卻應該要把參與的門檻降到最低，任何一種參與的理由都不應有貴賤之別。

以自己的方式參與議題應該是美好的事，即便我明白這樣的論述會有順風車、按讚不能改變世界的問題。但是可以的話，我更想鼓勵大家能以更多元的方式認識這個社會，並付出以改變糟糕的現況，達成眾聲喧嘩的公民社會。

⁵ 周孟謙，2012，〈從茲威騰村談起，談反核運動中忍耐庸俗的理由〉，苦勞網

之二：「你是哪個學校的？」

因為我的社會網絡，致使我在大三才得以算是真正的接觸到社會運動，和一開始便有台大學生會資源與網絡的某些人相比，或許起步便是較晚的，即使相較絕大多數的大學生，已是有著他人所沒有的管道。自身學校幾度帶給我困擾，而後發現在許多非台大的學校，異議分子也會有相似的困擾⁶：

我也漸漸發現自己內在的一份心理感覺正發生著，哈拿說她也有類似的經驗，就是，在生活中許多要訴說自己學校、填寫學經歷的表格時，都還是會處於一種希望能避開自己母校的心情、或者希望多列幾個「資歷」來向他人證明自己的能力是不容小覷的。奇怪的是，這樣的舉動還會自我反駁，說：你是一個異議者耶！你跟同校的學生不一樣，別的學校的學生、社會上的人不會這樣看待你，你的感受不過是自卑感的問題吧！於是我想著，想趕緊加入改革社會的行列裡，以為在社會實踐的過程，我能夠逐漸釋放這樣的憂鬱，但是那種被邊緣化的感受究竟是怎麼來的呢？一直到去年的學權營，我擔任隊輔，談論門禁問題時，有一位就讀明星大學的學員談到我的母校，他說他有一次因緣際會下參訪，他憂心著，如果教育過程中較沒有自制力的學生，若給予太多的自治空間，他們會不會暴動呢？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才終於清楚的明白，我內在的矛盾就在這裡，那種教育經驗裡的壓迫確確實實一直存在，它轉化成兩種形式，於我，是一種羞恥感。於這位學員，是一種歧視的眼光。在這一時刻，我明白，我們共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儘管台北大學在校排名上已是名列前茅，但這段描述對我來說是深刻的。好比其他具有學運歷史與完整學生會系統的學校，和自己所處的學校總是不可避免有些許差距。姑且不論這樣的裂縫與經驗差距是否真的如此明顯，或許是由於落在一個中間的位置，過去青年社的歷史亦未完全承襲，總在與他人介紹自己是台北大學時看見疑惑或不以為然的眼神。我相當認同北大社會系帶給我的一切，但卻又不可避免的想要多提一些資歷，想要多證明自己是可以的。

我們該如何看待與面對在運動中出現這樣的情緒，以及那些眼光？

之三：「你不能這樣搞運動啊」

在參與過程中也往往遇到經驗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參與限制。合理地，有經驗者可提供有效的分析使眾人可以理解現況，並給予適當的建議以達到運動的需求。但許多時候所謂的社運前輩，或是對經驗的重視，則會忽略，甚至傷害到某些素人的討論，甚至參與。

⁶范軒昂，〈一份學生運動的筆記：從一個邊緣的角度〉

又，曾經遇過一次經驗是在開會討論時，在決定是否要讓我參與某個任務時，一位前輩問我：「你有沒有主持過的經驗？」「當天多少人？」「你是社團的重要幹部嗎？」「你參加過的運動有哪些？」「你擔任過哪些職位？」「你有沒有開過記者會？」任務本身並不太困難，可是前輩這樣的問話確實讓我有些困擾。困擾在於，由於在場我的資歷比較淺(即使概念是如此，但使用資歷一詞感覺還是很奇怪)，因此我的能力與經驗需要被檢視。可是這樣的檢視也讓我疑惑，搞社運是開公司嗎？最終還是難逃能力至上嗎？

令我疑惑的是，在這個講求平等的組織，或著說在進步思想的氛圍底下，能力的差異似乎依然存在。即便可以不論階級、性別、族群，卻還是難逃以能力論人？又，能力與經驗如此重要嗎？對於能更好的完成一件事情或許是吧，但我想更激進的挑戰：在運動中因為自身情緒控管不佳、因為能力不好而被拒斥、邊緣的這些人，作為運動者該如何看待？是個人因素或是應看見其後的結構，反思其作為的意義？

在此分享一個案例，在個人擔任大學生學生權利調查小組時，便接觸到萬能科技大學的朋友，一位夥伴寫下以下這段話⁷：

因此 2011 年 1 月 20 日，邱智彥第一次與學權小組成員在野店碰面說明自身遭遇的故事，那時他提出的訴求是：「要校長下台」。我仍然清晰的記得在場學生們五味雜陳的表情，因為這個訴求在實際運動的經驗裡，門檻實在太高。

……我知道這些決定，是讓邱智彥再次回到校門口靜坐第一天晚上的那個憤怒感覺裡面，而他認定的「同志」是野店，而非學權小組。2011 年 2 月 14 日，邱智彥的靜坐已超過一個月。他跟我說他明天的行動要在校門口砸雞蛋，並思考更激烈的行動來逼校方出面。那個時刻我其實不知道該怎麼辦，來到現場聲援學生很多可能是沒有更激烈行動準備的，衝突的臨界點，誰負這個責任？於是，我做了一件事，打電話給學權小組的另一個成員莊程洋，我說：必須面對憤怒，邱智彥的、以及我們自己的。

15 日當天新聞畫面出來的很少，以媒體效果來說，並不太成功。但是，我卻看見有許多人在顫抖，其中包括程洋帶口號時數度喘著氣，難以言語，我很少看到程洋在公開場合這麼生氣。車道「佔領」沒發生，倒是模仿了另一個片段，邱智彥帶大家朗讀已擬好的心聲，他一句，我們集體跟著覆誦，在他身後像是一道巨大的音牆。程洋說，他在旁邊看，有些比較激烈的字，邱智彥臨場沒有唸出來。他沒有砸雞蛋，脫稿演出的是朗讀心聲過程流下來的眼淚，以及那個自製的「無」字大板子，野店朋友不言語衝上去遮蔽了萬能招牌，人們看見了，無能科

⁷ 范軒昂，〈一份學生運動的筆記：從一個邊緣的角度〉

技大學。那天邱媽媽現身，像個蒙面女俠的裝扮出現在人群的一隅，偶爾我想起這些畫面，偶爾在想，如果今天是一個明星學校的學生爭取學生權利，是否可以不用那麼生氣，可以少受一點質疑，少付一點點代價？

這個社會對待邊緣的方式是我們所無法接受的，但當我們實際遇到了某些邊緣的人，不論是作為工作夥伴或是協助的對象，我們該對這種不同——即便看似很可笑或不可能的方案，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我們如何對待運動中、組織內與我們不同的人？

之四：小結

這個篇章，是由於自身所處的大學相對而言位置邊緣，因此有感而發寫下此篇。事實上仍有許多可以討論之處，甚至我可以自我譴責一下，這篇所使用的例子甚至不夠邊緣，不夠卑劣，還不夠挑戰主流社會與社運的想像。當然，各種經驗的累積與理論爬梳是重要的，寫下這個篇章，也是提醒自己，如何避免讓自身的參與經驗去壓迫到其他的參與者？如何讓一個討論、讓議題的參與可以更公平、更友善？是否真的有所謂參與的資格呢？在一個關心人的發展與樣貌的組織下，這是非常值得被一再反省的。

最後，分享士林王家目前的狀態。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學生，在與王家的爸爸媽媽們討論下，他們蓋了燒烤窯，創了一個叫做「料理最前線」的網頁，每周分享與農村團體合作的美味料理，在房屋附近塗鴉種種花。以下為「料理最前線」⁸簡介：

學習和實踐我們在動亂、難以預料的時代所需要的，從來都不會太早。在現在，對於大城市的依賴——依賴它的醫學、它的農業、它的警政……。要擺脫這種命運，需要經過長時間不斷地大量、多方面學習與實驗。這意味著要知道如何戰鬥、撬開門鎖、治療骨折及咽喉炎、建立地下電台發射器、在街道上煮食供餐、瞄准目標、以及匯集散亂的知識來建構戰爭農藝學、瞭解浮游生物的生物學、土壤的組成、研究植物間的關聯，從而尋回已失去的直覺。

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是無頭無臉的無名小卒，戴上面具只為了讓你看見我們的存在，聽見我們的聲音。我們可以是任何人。

他們以這樣的方式在抗議，選擇一種生活方式，以實踐的角度去訴說他們要什麼樣的生活，吃什麼樣的食物，要什麼樣的「家」，對抗以發展為名的這個都市政策。

抗議不是只有開記者會、上街推擠，不是只有悲憤莫名。它也可以很有趣。

⁸ 〈料理最前線〉 <https://www.facebook.com/cookingatthefrontline/info>

轉過去！和人民站在一起！—抗爭現場、警察、國家暴力

在廣場上，我們為了成為人，
為了成為意義上的那個人，化作一具一具身體而已。

—紀錄片《廣場》

社會運動的參與形式是五花八門的，當然最常被聯想到的抗爭強度較高的形式，好比臥軌、丟雞蛋、擋怪手、反對強拆，也因此常常被認為是不理性的暴民，損害他人權益或失去控制。參與這樣的活動是危險的，在拉扯與推擠中很可能會受傷，甚至是被警察抓去做筆錄、有案在身也是可能的，種種風險造成許多家長會因此反對學生參與活動。當然啦，有些熱衷參與運動的學生其實對於參與抗爭強度較高的活動是毫不抗拒，甚至享受其中的刺激感。

自己在大學四年的參與過程中，也遇到幾次被警察抬走的經驗，有時與朋友們聚會時，也偶爾會討論如何不要受傷，或是以某些警察的術語自我解嘲一番。網路上亦不乏許多參與學生們在被警察抬走後，發表的心得感想，在此也依照自己所看見的進行簡單整理。在這個篇章，將著重在提出自己不論是參與或是聽人分享中，一些關於如何與警察應對的方式，以及學生們對於警察執法的討論。

(一) 警察來了！

不論是抗議、靜坐，特別是近幾年迫遷案頻傳，被警察抬走似乎已成為家常便飯，或許只要密切注意苦勞網發布的新聞稿，就可以找到一兩場可能會有警察抗議推擠的場合。個人在此粗略地將衝撞的場合分成攻防兩種：攻是前進到某處，通常是國家機關；防則是被動的阻礙警察進入，通常是迫遷案，但以個人參與華隆則是為了防止貨物被移走。關於被警察抬離的經驗與防止被抬的方式，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詳細的解說。至於以下則針對防守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的非暴力抗爭，將整個驅離的過程分成四大部分，大致有幾點原則：

(1) 靜坐：

身體放鬆，生理男與生理女交錯，手勾手。盡量互相靠近，不要讓旁邊的人落單。最好記得旁邊的人的長相，以免到衝突時沒注意到有人被警察抓走。此時通常會喊口號，或是唱戰歌⁹，讓氣氛更凝聚，也是希望警察會有壓力。在此期間，現場的警察指揮官會舉「行為違法」的牌子，用大聲公警告「xxx(被認為是首謀)，你的行為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請立刻解散」。在這個時候，為了讓現場指揮官閉嘴或是打斷他，場面會變

⁹ 常見的是萬年抗議歌曲：〈勞動者戰歌〉，依照議題不同進行改編。有的時候也會唱「幹不需要理由」(樂團名)的歌曲〈警察先生請你聽我說〉。

得相當吵鬧。通常會舉四到五次。當然，或許會好奇為什麼沒有明確的舉牌次數，這牽扯到台灣集會遊行法的訂定規範，然而集會遊行法與警察職權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也曾因此鬧出笑話。¹⁰

(2) 拖離：

到了舉牌第四次或第五次，警察會開始有驅離的動作。有些會拉扯同學身上的手環、手錶、皮帶，把人抬起來。此時要做的是讓身體放鬆，不要去和警察推擠或過度僵硬，身體僵硬警察反而很好使力。有些警察在拖離的過程相當粗暴，經常發生學生受傷的事件。如果有人受傷，務必要拍照存證，並記得去驗傷。通常口中會大喊「和平」，不僅是凝聚的口號，也是提醒同學和警察小心處理。生理女性可以大喊「性騷擾」，並要求女警。

切記，在此過程中通常警察會使用言語攻擊：「你媽看到你在這邊會難過」「你媽媽知道你在這邊做這種事嗎？」「不要這麼丟臉」「媒體都走了，自己站起來，自己走」等等，(仔細想想可以分析警方之所以如此愛提到大家的母親其中的性別意涵，比方女性總是被定位為照顧者之類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因為他們說了什麼就被挑釁，(曾經聽過「書不好好念在這裡當神經病」)，也不需要因為那句站起來自己走就乖乖聽話站起來。畢竟這是一個公民不服從運動。

(3) 結束：

被警方拖離並不如一般想像只是帶到旁邊，在抗爭現場不遠方會有警備車，被帶走的人會被拉上警備車看管。然而，即便被拖離，也不代表不能繼續抗爭。以個人的例子，被拖到警備車門口時可以擋住車門，又或著可以佔據警備車走道，不讓警方把其他夥伴帶上去。曾有人提出說可以偷拔警備車鑰匙，但目前仍未有人嘗試過。若無警備車，被抬到旁邊後可以再跑回去現場，繼續躺下。

當大家被抬上警備車，抗爭也到了結束的時候。警備車通常會開到偏遠郊區，但也有在市區裡遊車河的情形，是為了讓抗爭者無法再繼續回到抗爭現場。無論如何，這段期間，大家可以彼此聯絡，問問有沒有人受傷。有的時候會自我解嘲，下次被抬上車後應挑釁司機「你有種把我丟

¹⁰ 樂生青年到行政院長江宜樺官邸前抗議，一名參與工人臥軌的 a 同學也因沒課前往協助。到了靜坐現場，警方因為不確定樂生參與者的名單，看見 a 出現，便因為先前有案底所以將 a 作為首謀，進行第一次舉牌警告，表示應立即解散。a 發現自己被警察當作首謀，便衝到樂青前面大喊，「我宣布你們現在解散」，但樂青當然不理會 a 同學，a 同學跑去跟警察說「你看我叫他們解散他們不解散，那我要回家了」a 正要逃離是非地返校上課，警察一時情急，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名義將 a 同學抓上警備車。雖然最後法院判定無罪釋放，但過程拘留近 6 小時。

包到三峽啊」就可以直接回學校了。

當然，通常大家還是會再一次聚集到抗議現場，了解損害程度並商討接續策略。

上述是大致的原則，此外，警方會持盾牌推擠，在夏天尤其是因為短袖而容易被盾牌摩擦受傷，也最好小心在這樣的場合不要穿夾腳拖。在和朋友聊天時曾經開玩笑說，要是可以的話想要賣抗議懶人包，裡面放著護腕、球鞋或是薄長袖等，或許可以大賺一筆，大家也不用擔心會忘記穿適當的裝備而受傷；網路上也曾出現討論，可以再身上塗潤滑液，使警方無法拉起抗議學生¹¹。對於抗議技術進步的創意討論有許多，但也有像關廠工人在脖子上繫繩此類相當危險，衝突程度非常高的方式。不論如何，最基本的仍是以保持個人安全為主。

(二)當他們哭泣

第一次真正被警察抬(經歷上述三個步驟)是 2012 年暑假的華隆罷工。

簡單做個背景介紹：當時華隆的工人一部分被轉移成另一間空頭公司紡安的名下，宣稱換到紡安後，會漲一成工資¹²，但紡安要求年資重新計算，故沒有退休金與資遣費。由於許多工人正逢退休年齡，已無法在長期工作，故最後華隆工會決議罷工。發生罷工後，老闆和紡安的工人說，若是外面罷工者繼續下去，裡面紡安的人無法運作，就通通失業。因此紡安內部的人非常緊張，打算在某一天出貨在苗栗複雜的地方派系與金權勾結下，苗栗縣縣長陳明朝以罷工者妨礙他人自由為由¹³，讓警察協助工廠強行出貨。接到命令的我們和工人們一起坐在工廠門口，防止機具被搬出廠外。

從早上八點我們便在工廠前靜坐等待，由於是暑假，十分炎熱，靜坐的朋友汗流浹背。且由於工廠面積廣大，有兩個大門，我們必須輪流換班，互相通知近況。在下午一點左右，警察突然變多，擋在工廠門口，學生與工會也開始緊張起來。這樣緊張的氣息隨著內部員工的叫囂逐漸升溫，學生決定站在離大門最近的一排，以防工人被警察衝撞受傷。中間不斷帶口號，唱戰歌，也唱苗栗當地的歌曲。到了三點，內部鼓譟聲越來越大，充斥著對老同事的謾罵與挑釁。裡外的員工差點打起來，實際見證了工人們如何被分化。四點多，發現貨車開到後門，前門的朋友也立刻趕來堵門，學生在網路發布消息，並通知各校異議社團。

¹¹ 〈潤滑液戰技〉http://ntuwetboy.blogspot.tw/2012/03/blog-post_28.html?zx=e8c9a475e3c5fcf0

¹² 然而令人難過的是，在過去十年員工實際所領薪資僅為法定的七成，紡安的宣稱也不過就讓工資稍漲，並未真正達法定薪資。

¹³ 參與工運經常可以看見台灣法治的漏洞與腐敗，雖是以妨害他人自由，事實上在華隆工會擁有紡安該廠機具的所有書，所以機具根本是華隆的。紡安公司不僅是空頭公司，裡面的員工與工廠其實都是華隆，只是用招牌把華隆二字蓋住而已。

四點二十，眾人由盤坐改為躺下。四點半，警察開始抬人。

我並不是第一個被抬的，但由於是在第一排的學生，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周遭的人慢慢被抓走的感覺。或許是沒什麼經驗，警察抬得很久，但我們也從不斷喊著「華隆罷工、一定成功」，到後來沒有力氣只能呆呆地看著天空。

暑假的天空總是很藍，望著天空的當下老實說沒有想像中的驚恐，但卻有一股莫名的哀傷。在高度的緊張下，腦袋裡閃現的卻是奇怪的念頭：去年的此時是在其他國家舒適的度假，還是在冷氣房裡看小說呢？為什麼現在會在這裡呢？之所以會在此聽著那個載學生來回火車站的叔叔因為被粗暴拉扯的疼痛而發出的尖叫聲，聽到那個提供浴室給我們洗澡的阿姨的哭喊，聽到那個晚上煮好吃的麻油雞的叔叔對著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大罵叛徒的理由是什麼呢？

除了我們是參與罷工的人之外是沒有別的理由了，就只是因為我們試圖協助這些一起生活了兩個月的工人，取得這個社會虧欠給他們的而已。於法有據、但資方就是先擺爛，資源就是到不了他們身上，喊得再大聲，老闆不回來就是不回來，工作三十年，說沒錢就沒有錢。當下感受到的不是炎炎夏日和夥伴勾著手的黏膩，而是一種無以名之的悲痛與惡寒。在警察開始出現擋住天空，掰開我們的手指與關節將我與夥伴拉離的當下，我們能做的沒有別的了，學術與我們的背景毫不重要，我們就只是一具具身體而已。

警察開始抬人後就是一片混亂，推擠的過程大約維持一個小時，我在最一開始的二十分鐘就被警察丟在路邊。印象中邱毓斌老師當時也在現場，對警察吼叫不要傷害學生，然後把我和幾個被丟在路邊的同學叫去，先詢問傷勢後告訴我們去注意是否有人被拖到旁邊施暴。於是我和伙伴又衝了回去，這次連貨車都開出來了，一位工人鑽到車底下。非常緊張，深怕有人受傷，卻仍記得剛剛被踩到腳的疼痛。工人們手拉手圍住貨車，警察在中間以盾牌將人群撞開。硬是擠了進去，試圖阻止警察再繼續用盾牌衝撞較為老邁的員工。每個人都在推擠，過程難以呼吸。最後貨車退了回去，總指揮大喊：「有人暈倒了，大家先撤」，工人與學生便紛紛散開，發現一位工人心臟病發，緊急救護了一下，所幸救護車很快趕到，便送往醫院，衝突停止。

暑假的天空暗得很快。蹲坐在工廠門口，大家露出疲態，一些工人倚靠著工廠圍牆啜泣。以結果來說，這波推擠是成功了，貨車沒有出來。可是大家都很累了，肉體上與心理上。

一位阿姨過來坐在我旁邊，沉默了一陣我轉過去問她有沒有怎麼樣，她先搖搖頭說沒事，然後就突然抱著我大哭。她只重複著一句話，我想也是當時所有人無力的彰顯吧。她抱著我一面大哭一面說，「我這輩子明明沒有做不好的事，為什麼會這樣？我沒有做壞事，為什麼這個社會要這樣對我？政府恨我們嗎？」是

啊，為什麼呢？因為她們不聰明所以才去當工人嗎？因為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這樣子嗎？實在非常非常的不甘心啊。但不甘心歸不甘心，學生們又聚集起來，決定繼續討論明後天的運動策略。

有些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某些運動者如此痛恨警察，但我想，若以生命經驗來說，或許是很可以想見的吧。尖叫、疼痛、哭喊、崩潰，夥伴一個個被拉扯離去，盾牌在身上猛砸、手指因摩擦流血的疼痛，挑釁的話語以及無法反抗的無力感湧現，從警備車上百般聊賴地看出去，甚至是王家那種家中的玻璃一片一片被擊碎，親眼看見協助的對象，一起生活的同伴們因為絕望不甘流淚的樣子。有些夥伴在路上看到警察還是會膽戰心驚。

在這裡僅是簡單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被抬離的經驗，寫得比較煽情，不過當然，其實是不需如此把警察妖魔化，也不必把推擠或衝撞想像的如此神聖。事實上後續幾次被抬走倒是沒有太多慷慨激昂，只是注意著周遭是否有人被粗暴對待，或是跌倒受傷而已。但我想，在看待這樣的推擠時，過程中的情緒與創傷是很真實的，對於甫參加或是並非習慣於衝突場面的人，應小心處理事後的情緒，以免造成創傷。

(三)「你可以不要射中」

抗爭現場總溢滿著強烈的情緒起伏。每次大型抗議回來，總有些人痛批警察執法過當，而也會有人出來討論警察本身不得不然的問體。

然而，對於那種「你又沒有被抬過你怎麼知道」的指控我個人並不特別同意，除了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到抗爭現場，以及每個人的情緒感受生命經驗不同，我也不覺得有必要如此妖魔化警察，雖然他們有時真的非常令人討厭。但對於他們所處的結構位置來說，不去拖離所謂的暴民是不可能的，何況他們所受的專業訓練就是如此，盡可能快速、效率的達成目標，並不關照過程中遇到的人事物處於什麼樣的狀態。也可以說他們是受到國家權力的驅使，是不得不為，實際上我們也遇過警察在抬人的過程中哭了，或著是有女警幫忙擦拭眼淚，說著請不要受傷了等等。

去討論警察到底是不是罪該萬死好像也並不如此具有意義。我自己對於這個部分，曾看過一個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

1991年9月，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的德國，在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四個三十歲不到的年輕人將要接受審判，他們曾經是柏林圍牆的東德守衛。

兩年前一個冬夜，剛滿二十歲的克利斯和一個好朋友一起企圖爬過柏林圍牆逃向自由。幾聲槍聲後，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他很快就斷了氣。他

不知道，他是這面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那個射殺他的東德衛兵，叫亨裏奇。當然他也絕沒有想到，九個月之後，圍牆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終會站在法庭上因為殺人罪而接受審判。

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的衛兵亨裏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他的律師辯稱，他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

法官當庭指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政府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士兵，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利，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這是一位香港人陳雲所撰寫的，在此篇結束後也引發不少警察回覆¹⁴。當然這不是本次撰文想要討論的。聽說這個故事是假的，但裡面想傳達的意思很有趣。不只是警察，我們在面對行政單位亦常面臨如此討論：到底是不得不然還是未曾嘗試？我們是否有別的選擇？結構與能動性的辯論是社會學難解的議題，我也無法做出一個絕對的回應。然而我想，從這個故事我所讀到的，並想傳達的是，即便在面對我們不得不做出決策的狀況下，也希望，在面對人的時候，仍同樣保持自己身為人的樣子。

¹⁴ 相關討論整理連結：<http://lingsir.org/pol170.htm>

結語—未來的自己

終有一年春天
我們的子孫會在報上讀到
頭條新聞如下：
冬候鳥小水鴨要北返了
經過淡水河邊的車輛
禁鳴喇叭

—劉克襄，〈希望〉

大四下，這是最後一次的社會實踐報告。即便實踐本身或許仍會持續下去，但對我而言依然是一次很好的經驗，可相較系統性地整理在運動中看見與遇見的問題。這份報告的野心在於分享個人在社會運動中體驗到的不同面向，盡管受限於個人能力，無法解答亦無法提供理論參照，某些有趣的題目亦未討論，他日仍會持續精進分析的深度與廣度。

在這個報告的撰寫過程並不好受，實際上，或許是因為撰寫主題畢竟是自身經歷的種種，每次社會實踐的撰寫都會帶來深淺不一的不適。這樣的不適是什麼呢？我總認為，社會實踐是一連串自我崩壞的過程。並不只是紀錄發生的事情而已，必須不斷反思從小到大，家庭、學校、體制等等在身上進行的建構，然後崩壞，反饋，再重新長成。解構的過程去看見自己的不足與無知，找到自我實踐的路線、累積個人有機的生命經驗、找到自身的生命政治。

對我而言，這是恐慌的，但也是必要之惡。執意完成這份報告，盡管內容仍是粗糙不堪，準備不算充足，也是想給自己大學四年如此重要的部分一個交代：去面對自己的位置，面對自己的不足，然後接納自己的狀態。

參與的過程於我而言是複雜的，不會是一句熱情、正義能概括論之。面對自己是否不夠犧牲奉獻的質疑；面對自己時而不敢與人爭執的軟弱；面對自己的卑鄙與算計；面對自己被沖昏頭的那些片刻；面對在靜坐的過程被警察抬的當下，認為自己僅是一具抵擋著怪手或暴力的身體的無力；又或著，在無數次的訪調、記者會、抗議、推擠中，發現某些事情某些官僚仍然一如往常，甚至是變本加厲的以其資源來壓迫弱勢者，發現一切好像徒勞無功而萌生的憤世嫉俗與壞念頭，面對矛盾與挫折，甚至是在壓力大到臨界點，常常自問「我為什麼非得做這些事不可呢？」「不做也不會死啊」種種怯懦與逃避。

但是回過頭來，越來越深的投入，我也有更多的收穫。看見社會的美好與不美好，看到努力的人們為了自己的目標亦步亦趨地前進，看到身旁的人事物一點

一點的改變，並且得到了一群好夥伴。即便是這麼怯懦的我，夥伴們還是能好好地包容；即便是在其中仍有需要質疑與挑戰的，但有伙伴可以共同討論這些困惑，就能讓自己好好思考，朝向想成為的方向努力。

因此，在我參與運動，遇見這些被壓迫的人們之後，我將如何面對他們呢？未來我該如何走下去呢？前些日子有個突發奇想，有時候，在社會運動的宣傳上，往往看見悲慘而哀傷的故事做為引發共鳴、抵抗結構的方式，雖然可以觸動人心，但在實際的人生則是深淺不一的苦難。或許因為自己是個非常平庸的人吧，因此叛逆的認為並不是只有最為美麗最為悲慘的人才能受到重視。抵抗既是日常性的，那去檢視在日常中，生命中充斥著什麼樣的壓迫，去分析解構並檢討，也是重要的。比起去寫故事，更想試著能找到故事背後的邏輯。然而如何能分析、探究，這樣的學術能力則是未來需要努力的了。

最後，分享一段詩句作為這次實踐報告的結束，也是對於未來的勉勵。

我心有所愛，不忍世界頹敗
—羅智成，〈一九七九〉

希望能對這個社會常抱一份熱情，
希望能創造一個溫柔的社會。

※註：本篇報告經過修改，將部分團體匿名處理，同時由於先前未告知照片來源，已將附圖刪除，如有不便敬請見諒。